



余大钧·译注

(蒙汉合璧) 蒙古文历史文献汉译  
**蒙古秘史**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蒙汉合璧) 蒙古文历史文献汉译

# 蒙古秘史

余大钧 译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出版说明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倾力出版的《(蒙汉合璧)蒙古文历史文献汉译》丛书,共8册10种书,分别是《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蒙古黄史》《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阿勒坦汗传》《阿萨喇克其史》《内齐托音一世传》《内齐托音二世传》。

本丛书所选的十部蒙古文史著为自13世纪到19世纪在中国和东西方众多国家广为流传的蒙古文史书,国内外已经有了多种文字的翻译本,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汉译丛书”的出版规模。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汉译丛书,希望能弥补这个遗憾。

该套丛书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先导,注重历史文献的大众普及,在原本译注的基础上,增加了蒙文原文版本的影印件,突出了“蒙汉合璧”的出版价值。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保护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尽绵薄之力,同时也能为国内外学术同仁提供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疏漏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期待广大读者不吝指教,以便以后修订完善。

## | 蒙古文历史文献导论 |

各国蒙古学家们从 18 世纪起就开始搜集整理、研究蒙古族的书面文献、石刻文献等等,这不仅为我们今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丰富的文献资料。据我们了解,各国蒙古学家们从 1225 年的《成吉思汗石》文开始到 18 世纪末为止所发现的蒙古文历史文献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从这些遗留下来的或全文或残缺不全或点滴散存的各种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游牧民族丰富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的轨迹。为了叙述之方便,我们在本文中以朝代为序,以古代蒙古文历史文献的出土和发现地点为基本线索,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近发现的蒙古文历史文献作一概要介绍。

### 一、大蒙古国时期(1206—1271)

13 世纪早期,北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神话般的蒙古帝国。在北亚和中亚新生的这一游牧帝国(名称为“大蒙古国”)把整个民族带到了一个从“野蛮”转向文明的、充满了向上精神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是游牧蒙古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也有了自己的文献——蒙古人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得力于大量的部落战争,他命令每一个部落都必须由一个直接对蒙古大汗负责的人来统治。然而,就当时在蒙古周边民族的历史发展情况而言,他还需要与另一个文明世界的定居民族发生交往,并且懂得:游牧帝国的移动势力会因为与不能够移动的农业定居文明的势力相联系而导致其帝国的崩溃。另外,为了避免新成立的帝国从内部瓦解,他还制定了一整套可以限制游牧民族贵族们个人实力的扩张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制度。当然这套规范制度必须像定居农业

民族的政权一样,要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成吉思汗攻打奈曼部落时俘虏了新疆绿洲中的一个畏兀儿(回纥)人,命令他制定畏兀儿蒙古文字,即把蒙古语和畏兀儿字母结合到一起的文字。现代学者们将这种文字称之为“回鹘(畏兀儿)式蒙古文”或“回纥(畏兀儿)蒙古文”。这一名称的意思就是指从畏兀儿人(此为蒙古人的称呼,与汉文所称回鹘人相同)借用粟特体字母表创制的蒙古文,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畏兀儿人创制的畏吾儿文字。畏兀儿蒙古文是蒙古人最早的民族文字,现代蒙古文、托忒体蒙古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满洲文字母也是从畏兀儿蒙古文脱胎来的。

成吉思汗当时让这位被俘的畏兀儿人教太子及诸王用这种文字书写“国言”(蒙古语);他还建立文官制度,并任用一部分通本国文字的畏兀儿人和一些讲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回教徒,使他的继承者在与“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族打交道时,尤其是与他们南面的有“围墙”的具有古老文明的定居民族发生关系时,不必再完全依从他们的文官(内地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这个文官阶层,从蒙古以前的古代北亚游牧民族进入该地区时就开始利用他们的文字来推行政事,致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者也自然而然地利用他们的文字作为管理新征服地区居民的工具。

成吉思汗与众多蒙古人不一样,在其一生中从未夸耀过自己的功劳和荣誉。我们从成吉思汗创制文字算起,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首次用蒙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即学界所称《成吉思汗石》(其实该名不准确)中可以看到,碑铭不是歌颂成吉思汗个人的荣誉,而是记载了从1219年到1224年跟随成吉思汗血战花刺子模国的成吉思汗之弟合萨尔次子也松格(约1192—1267)的荣誉——他获得了成吉思汗降旨刻碑的殊荣。

蒙古人的历史进入到有自己文字的时代后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献,其中具有直接史料性的历史文献有以下几部:

- 1.《青册》(阔阔·迭卜帖儿):13世纪初问世。该书是记录成吉思汗“大札撒”(大法典)的畏兀儿蒙古文笔录,内容为记录大蒙古国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bilig)等都被保存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的判例,

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面。由此可见,《青册》是一部法典与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的真实笔录。该书是在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大断事官(Jarquči)失吉忽秃胡的领导下编写而成的。著名旅行家术外尼是唯一知道大札撒内容的波斯史家,他说《青册》里“有很多札撒条文”,但他阐述得不多。直到元代时,成吉思汗的法律训言仍然有特别的影响力。据波斯史家拉施特说,当元成宗铁穆耳(1295—1307年在位)与其长兄晋王甘麻剌为争夺皇位而激烈斗争时,他的母亲阔阔真哈敦提出,“忽必烈合汗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bilig,意为法律训言)的人登位”。于是,诸王都背诵成吉思汗的必里克,在场的长辈们据此予以裁决,结果铁穆耳背诵得最好,因此被选作可汗。<sup>①</sup>由此看来,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在元代时期仍然被保存的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威信。据其他学者说,该书的原本保存了三代。

2.《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此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写“鼠儿年七月写毕”,对这一年份学界有不同看法,分别认为是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该书主要内容为成吉思汗先人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看来不是一次成书,而是经过了不止一次的补充和修订。<sup>②</sup>原文明初已散佚,在罗藏丹津的蒙古文《黄金史》中遗留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佚文。现存的汉文音写本是明朝四夷馆的汉文音写本。汉族学者称其为《元朝秘史》。

以蒙古民族典范文献著称的《元朝秘史》(共12卷,《永乐大典》收录15卷),是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文史资料。该书的原名为《蒙古秘史》,为佚名氏撰。原文系以畏兀儿蒙古文写成,现已佚失,现世传仅有明初洪武年间遵钦命所撰,并附有汉文总译。本书除系统叙述蒙古人的起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事迹、蒙古汗国的建立与对外征服的业绩外,还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等做了真实的反映。引叙事实多通过传说、故事、谚语、格言、诗歌等形式写出,它不但是蒙古早期

① (波斯)拉施德:《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汉译本,第375—376页。

② Yekeming γadai Yirincin-u serg ügelte : Mongyul-un ni γuca tobčiyān, koke qoda, 1987, pp. 81 - 83.

的历史巨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语言的珍贵文献。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并称为蒙古民族的三大史作。此书不但我国学者做过注释(注:清·李广田:《元朝秘史注》,清末沈曾植:《元朝秘史注释》等),国外学者也很重视。日本史学家称其为蒙古早期历史时期唯一的“金字塔”式的巨作。国外早在19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俄、德、法、日等诸种文字的译文。

在俄国,有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帕拉迪乌斯(Palladius)译述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传说》一书(俄国驻北京传教士著作集,1866年)最早出版。在欧洲,一直从事蒙古文献语言学研究的德国学者海涅什(E. Hanisch)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进行了译文还原尝试的《元朝秘史》(第一部)(莱比锡,1931)等著作。在法国还有东方史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元朝秘史卷——蒙古语和译文(附译注)》遗稿的出版。该书由于是对蒙古原文进行了还原,并兼及了译注,一时轰动了蒙古史学界。

在日本,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蒙古秘史》的研究著述。首先,由那珂通世最早日译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于1907年公开出版,因为穿插以流利文言文笔的蒙古语译文,并兼引了若干汉籍,再加以丰富的译注,而被称为日本明治时代不朽的东方名著(筑摩书房,1907)。其次,进入昭和年代,又相继有小林高次郎日译的《蒙古秘史》(生活社,1940)、《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还有白鸟库吉的《音译元朝秘史》(《东方书文库》丛刊9,1942)等著作出版。这些译著从语言学角度,力求将汉文音译还原成蒙古语,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实为语言学研究的巨作。这一时期,学者服部四郎还发表了与小林高次郎《元朝秘史研究》同一主题的《元朝秘史中出现蒙古语言汉字之研究》的专著(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从1984年起,日本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全释》和《元朝秘史全释续考》陆续出版,共6卷,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蒙古秘史》研究史中的一座丰碑。

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什、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等先后发表了《蒙古秘史》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

3.《金册》(*altan tebter*):成书约比《蒙古秘史》晚几十年,而论及研究史,则比

《蒙古秘史》早几十年。14世纪初,波斯史家拉施特(1247—1318)先后受蒙古伊利汗合赞和完者都之命修撰《史集》。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他在修撰《史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和研究了当时秘藏于蒙古伊利汗国宫廷金库中的蒙古文《金册》。他是对这部文献最早也是唯一的研究者。用拉施特的话说,该书是蒙古人“逐代均曾用蒙语、蒙文加以记录,唯未经汇集整理,以零散篇章形式[保存于汗的]金库中”“秘藏”的“信史”,“有关蒙古起源的史籍、与蒙古有亲属关系的突厥诸部的世系”。拉施特充分利用并考订、整理了《金册》这部蒙古文古代历史文献。拉施特研究《金册》的年代,应当与《史集》的写作同时进行,即在1311年至1312年之间。

《蒙古秘史》和《金册》这两部蒙古文历史文献,都在宫廷中被撰写、秘藏、研究过,因此,这两部蒙古文历史文献具有共同的、特殊的地位。

4.《萨迦格言》:又译成《善说宝藏》,吐蕃萨迦派高僧贡噶坚赞(Kun dgav rgyal mtshan,1182—1251)著,原文为藏文,蒙古文译本于1269年前完成。关于蒙文译者密咒大师索南戈拉的生平,文献资料没有什么记载,故暂无法做详细介绍。《格言》共457段,每段4行,共1828行。1921年至1931年间匈牙利蒙古学家李盖提(L. Ligeti)在内蒙古旅行考察期间从喀喇沁旗公爷府获取蒙古文译文。原件今收藏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布达佩斯国立图书馆)。《萨迦格言》是中世纪蒙古语标准语的重要文献,从13世纪以来在藏蒙地区广为流传。

5.此外,忽必烈于公木虎年(1254)给西藏僧侣的《藏文诏书》(*jav sa bod yig ma*)和鼠年(1264)《珍珠诏书》(*mu tig ma*)等两份文书的原蒙文件虽然丢失,但其完整的内容被保存在藏文文献中,被学界认定为对研究蒙藏佛教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献。

6.黑城蒙古文献残片:1907年到1909年间,俄国东方学家柯兹洛夫(P. K. Kozlov,1863—1935)率领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探察队到中亚极东部藏区进行了考察,并从死城哈喇浩特(即“黑城”又名“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书籍及其残片和西藏、蒙古等民族的文献及其残片。这是20世纪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然而,其中发现的蒙古文文



献只有 17 件。对此,过去虽有一些研究,但只是对其文字、内容进行研究而已。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知之者很少。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D. Kara Gyorgy)于 2003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写的《东方文献》(第 9 卷,第 2 辑)上发表了从哈喇浩特出土的 19 件(包括回鹘文 1 件)蒙古文印刷品和手稿文书(大部为残片)的全部照片及其拉丁文转写,并撰写了评注,<sup>①</sup>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中世纪蒙古文本文献,可谓功德无量。这些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与蒙古古代历史相关的有早期借贷文契、寺院经济、契约、信件等蒙古社会经济文书,此外也有佛经故事、入官、推官等官方文书,尤其其中发现的成吉思汗与阿鲁刺惕氏的字斡儿出那颜(G110 背面)、忙兀惕部的智者之间对话的残片是属于成吉思汗至理名言的具有诗歌韵律的早期文献。另有《也先帖木儿给西域火洲之地官员的令旨》是蒙古统治者管理西域的范例之一。

7. 伏尔加河畔发现的桦树皮文献《母子情感歌》:1930 年,在中世纪属于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斯(约 1243—1502)领土的苏联伏尔加河右岸下游的一座古墓葬中有一位农民发现了带有装订线的 25 叶桦树皮文献,25 叶中的 13 面写的是畏兀儿体蒙古文。这是 13 世纪末的文献,学术界将其称为《金帐桦树皮文书》,亦称《母子情感歌》。这首情感歌叙写了一个蒙古普通劳动妇女送儿子服兵役时的嘱咐和出发远征的儿子对母亲、家乡的思念之情,其内容与蒙古西征历史有密切联系,并且从其渊源而言是来自民间的一首对唱歌。原件今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艾米塔尔(Ermitar)博物馆。

## 二、元朝时期(1271—1368)

1. 统治波斯的蒙古汗国—伊利汗国的诸王阿巴哈汗(Abaqa khan)、阿鲁浑汗(Argun khan)的两份信函,合赞汗(Qazan khan)、完者都汗(Oljejitu khan)等于 1267 年(或 1279 年)、1289 年、1290 年、1302 年、1305 年分别致罗马教皇和法国国

---

<sup>①</sup> G. Kara, Mediaeval Mongolian Documents from Khra Khoto Xiyu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9, No. 2 June 2003, St. Petersburg.

王的外交信函。这几份蒙文信函对研究蒙古与欧洲各国的联系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文献今分别收藏于梵蒂冈档案馆和法国档案馆。

2.《亚历山大传奇》(*Sulqarnai-yin tuγuji*):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残篇 13 叶,被认定为 14 世纪初由波斯文译成蒙古文。今收藏于德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其对研究蒙古与西域文化交流史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3. 蒙汉文对译《孝经》(*takimdaqu nom*):大德十一年(1307)木刻版。今原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这部文献对研究元代蒙古人的语言、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文字学价值。

4. 吐鲁番发现的蒙古文文书:从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蒙古文文献是在德国人几次进行吐鲁番考察过程中获得的。这些文献是于 1902—1914 年间由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以及后来的普鲁士科学院吐鲁番委员会先后组织了四次考察队派往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所得的蒙古文文献。通过四次挖掘共获得 105 张蒙古文文稿,其中大部分是元明时期的文书之类。自从艾里希·海涅什(Erich Haenisch) 1959 年发表了《柏林吐鲁番文集》(*Berliner Turfansammlung*)中的大部分蒙古文文献影印件以来其中的许多残页被欧美各国和蒙古国的蒙古学家们研究整理过。其中 1993 年蒙古国的策仁索德纳木(D. Cerensodnom)和德国的陶贝(M. Taube)合作刊行的《柏林吐鲁番文集中的蒙文文献》成为最新的、最完整的研究著作。

从吐鲁番发现的文本文献除了《亚历山大传奇》以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吐鲁番文献中的统治中亚河中地区的察合台汗国(1221—1508)后裔秃忽鲁帖木儿(1346—1363,中亚文献中出现的蒙古斯坦的第一代汗)于 1352 年给河中三个地域长官们的一份令旨(Uge, 共 9 行字),于 1348 年或 1360 年派遣大臣也先到高昌地区办理公务的令旨(共 16 行),于 1353 年派遣孛罗海牙(Bolad qay - a)为首的使臣等到某地接纳使臣所需物品的令旨(共 12 行)以及秃忽鲁帖木儿之子亦里牙火者(Ilasqoja, 1363—1370 年在位)于 1369 年下达篋儿乞惕将军的有关豁免民户赋税的圣旨(jarliγ, 共 20 行);还有给印度斯坦使臣的羊年圣旨(共 17 行);察合台汗国第 14 代汗怯别(Kebeg., 1318—1326)于 1326 年颁发黑色印章的解救赔款令旨(共 10 行);第 21 代汗也孙帖木儿汗(1338—1339 年在位)给驿站的圣旨(共 14

行)等文书都是盖有红色印章或黑色印章的完整的畏兀儿体蒙文官方文书。这些文书是研究河中地区察合台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方面有一定意义的重要资料。

5. 关于元代所译《彰所知论》蒙古文版及相关问题。元代,八思巴有一名著,书名为《彰所知论》(藏文为 *shes bya rab tu gsal ba*)。学界对此书的成书年代及藏、汉、蒙古文版本问题至今有不同说法。过去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不存西藏语或蒙古语的原书,只传中译本”。经王启龙先生的努力,发现了其藏文原版完整地保存在德格木刻板《萨迦全集》(*sa skyavi bkav vbum*)函中。在这一重要发现的基础上,经他专题研究,对《彰所知论》的藏文原文的写作年代目前可以定论,即“《彰所知论》藏文版中明确说明,八思巴在戊寅年(*sa pho stag gi lo*, 阳土虎年,1278年)于萨迦寺写成此论的”<sup>①</sup>。同时王启龙还指出了其汉译本成书于1306年以前。至于《彰所知论》的蒙文译本,在学术界至今仍然是个谜,王启龙根据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教授于1959年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版的《蒙古人的家谱与宗教历史文献》(*Die Familien-und Kirchen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一书的说法,认为“蒙文本时间更晚”,“至于蒙文本是译自藏文原文还是汉译文,尚须考证”。<sup>②</sup>

海西希以前俄国的蒙古学家科瓦列夫斯基首次提出,17世纪蒙古著名佛学翻译家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一部著作即《必用之全义经》(*čiqula keregleküi tegiis udq-a neretü sasdir*, 也有人译成《本义必用经》)是八思巴喇嘛所著《彰所知论》的蒙古文译本或改写本。<sup>③</sup> 尤其是我们看到王启龙先生发表的藏文原文后认为,蒙文《必用之全义经》是一部完全独立的著作,而不是八思巴喇嘛《彰所知论》的译本。只要将蒙文《必用之全义经》同《彰所知论》略加对比,便不难看出这一点。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在其著作中未曾提及八思巴喇嘛的著作,绝非偶然。他在

① 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之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39页。

② 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之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25—226页。

③ O. M. Kovalevskii, *Buddhiskaya kosmologiya*. Kazan, 1837, p. 13.

《必用之全义经》的“跋语”中指出,作者是“应克穆齐克兀惕(部族)之善胜菩萨为首,明慧者希绕曾格二人以无垢虔诚之心再三请求译之此著,据前圣者之神圣教诲与犹如冉冉上升的太阳般照耀之诸种经典之含意进行详实对勘后,名为满洲什礼·固什·锡埒图·绰尔济者,为犹如太阳般弘扬顶圣释迦牟尼之教,实为撰写而成。”要指出的是,海西希等学者所利用和发表的抄本“跋语”与笔者所看到的几种抄本以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竹笔抄本之间差别很大。据我们考察,海西希所利用的抄本,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版本学角度而言,可以说是一部较劣质的抄本,不足凭据。

就内容和结构而言,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这部著作与八思巴喇嘛的著作完全不同。据藏文原文,八思巴喇嘛的著作是由五个部分,即器世界品、情世界品、道法品、果法品和无为法品组成的。而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著作可分为四个部分,即佛陀生平及其佛教学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印藏蒙王统世系、佛陀学说中需要知道的要义。

这样我们首先肯定了国内外现在流传的蒙古文《必用之全义经》不是八思巴喇嘛《彰所知论》的译本。那么《彰所知论》是否有蒙文译本?若有,何时翻译成蒙文?据我们的新近发现,《彰所知论》确实有其蒙古文译本,今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图书馆,书名为《彰所知论》(*Medegdegün-i belgetey-e geyigülügci ner-e-tü Sasdir*),版心:36.8cm×9.5cm,共1—52a页,每页28—29行字,竹笔抄本。该抄本大约是清代1720—1730年间所抄。但我们根据抄本的句型结构、语言修辞和词法特征以及保持回鹘文书写形式和回鹘式佛教名词术语的多次出现等情况来看具有元代蒙文译经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此抄本的译文属《彰所知论》的元代蒙古文译本的可能性很大。

### 三、北元时期(1368—1635)

1. 明朝景泰帝蒙古文敕书:汉文称“皇帝敕赐刺儿地面头目咩(yang)力儿吉的诏书”。这是明廷用蒙汉两种文字致伊朗刺儿地区(刺利斯坦 Laristan)长官的诏书,发诏书时间为明景泰三年(1452)十一月二十九日。原件收藏于土耳其国伊

斯坦布尔市土布卡皮宫博物馆(Topkapi Sarayi Muzesi)。<sup>①</sup> 本诏书以及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证明,明朝最初的百余年里,蒙古文曾是明朝与西域某些国家之间进行联系的外交语言和文字。

2. 阿勒坦汗于 1580 年用蒙汉文对照的呈明朝皇帝的信札和《高昌馆课》(1407)也属于北元时代的用汉文逐字逐句译写,不顾蒙文语法特点,不懂汉文的蒙古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文献,但学术界完全可以理解和利用其内容。

3. 《阿勒坦汗传》:原书题曰《名为宝汇集之书》,蒙古文原本为削竹笔手抄本,作者佚名。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据学者们的考证是在 1607 年。全书共 54 经卷页,计 107 面,全书采用韵文体,以押头韵的四行诗为其基本形式。此书原藏于内蒙古乌珠穆沁右翼旗王府家庙内,现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天下孤本。主要内容为赞扬土默特万户领主阿勒坦汗(1502—1582)一生的业绩,反映了当时蒙古右翼三万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西藏佛教格鲁派等首次传入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并提供了很多过去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

4. 《白史》:原名《十善福经白史》。不少研究者根据 16 世纪著名思想家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1586)重编的《白史》一书的“前言”认为,该书为元代忽必烈之作。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说。最早发现此书的是 16 世纪下半叶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据洪台吉说,他从松洲城获得此手抄本后,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的旧抄本互校,并写“前言”公布于世。此后《白史》流传于世。从该书的整个内容来说,是一部有关蒙古国家体制与法制方面的典章性著作。

5. 从阿伦苏木(olan süm-e)发现的文书: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Egami Namio)率领的日本考察队先后于 1935 年、1939 年、1941 年在阿伦苏木古城(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之北三十余公里)遗址上进行挖掘后发现了 200 多件蒙古文文献残片。据德国海西希(W. Heissig)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残片属于 16—17 世纪手稿。原件在日本国保存。1976 年,德国海西希教授将其全部残片影印出版,并进行拉丁文转写、识读和考证(其中 29 件残片无法确

---

<sup>①</sup> F. W. K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Edict of 1453. in the Torkapi Sarayi Mütesi HJAS, X III, 1950, 431—446 页, 1—VIII 图片。

认),为蒙古学界首次提供了阿伦苏木古城出土的蒙古文文献。残片的大部分是佛教经典、咒语经的抄本,也有不少有关天文历书、算卦书、格律诗以及与民俗学相关的重要的蒙文文献。

6. 蒙古国发现的《阿勒坦汗赞歌》及 17 世纪的桦树皮蒙文文献:由蒙古国考古学家 H. 普日来(H. Perlee)带领的考察队于 1970 年在蒙古国布拉干省南部的哈刺布罕·巴尔嘎松城(黑牯牛城)遗址中发掘出 1 400 多块写有蒙古文和藏文的桦树皮文献。其中只有一部分蒙文法律文书由蒙古国已故学者 H. 普日来公开发表,其他文献仍在蒙古国。这些文献学术界认定为 17 世纪前半叶的产物。1994 年 7 月初,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举办了蒙古桦树皮蒙文文献展览,这是在蒙古国发现的上述桦树皮蒙古文文献中的一部分。在德国展览的桦树皮蒙古文文献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蒙古国运到德国的粘连在一起而成为几乎无法修复和拆开的一大团整块物品。经德国有关专家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修复并还原成可以识读的桦树皮文献。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准备将这些桦树皮蒙古文文献全部出版。2000 年,他们的首批成果在德国威斯巴登公开出版。根据该出版物,我们看到研究者们对其中的 110 份文献进行了内容分类、拉丁文转写和关键词语的考订和解释。他们认为这些文献写就时间大约在公元 1600 年左右。尽管幸存的这些文献大部分是残缺不全的、不连贯的甚至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但是,这些文献与内蒙古黑城、阿伦苏木和新疆出土的吐鲁番蒙古文文献一样能够留存到现在,并被发现,最终成为能够使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和读者看到和了解其内容的罕见文献,仅此一点就说明了蒙古人在元代和北元时期曾拥有过很多我们现在不甚知道的蒙古文文献。

从这些文献的内容来看,其绝大部分仍然是宗教经典,但还有一部分是宗教领袖人物、政界领袖的赞颂诗歌和民俗学方面的资料,如:其中的熏祭用品及其礼仪祭词、招魂词及祭火招词、各种民间咒语、历法书、占梦书、星占书等类文献在佛教传入蒙古以前和以后都曾有过,是研究蒙古民俗及风俗习惯不可缺少的资料。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出版物中有一首《阿勒坦汗赞歌》。这是一部极罕见的文献,尽管它只剩下严重破损而无头无尾的一叶(第 6 叶)的两面文字残片。残片

中我们可以读到以“啊,我们的阿勒坦扯辰汗”一句为隔、四行重复一遍的优美的诗句。诗中描绘了阿勒坦汗的生平业绩,如建寺庙、修建呼和浩特、在平川上耕种农田、远征卫拉特部、从汉地掳掠财物、使自己的人民过上太平富裕生活等语句。据此,我们毫无犹豫地可以肯定,这是一首记录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一生业绩的长篇叙事诗。仅此一点,该残片就可以作为在蒙古史及蒙古文学研究上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发现而被载入史册。

7.《黄金史纲》(约1628年成书):作者佚名,多种抄本流传,有学者认为2002年蒙古国乔伊玛发表的影印本为最佳抄本。该书是继《蒙古秘史》出现后又一部集中反映从古代到林丹汗即位为止的蒙古历史,是研究北元汗系和诺颜、台吉谱系的珍贵资料。

#### 四、清朝时期(1636—1911)

有清一代蒙古人则有了大量的书面历史文献、石刻文献、宗教文献、语言文献、法典文献、翻译文献和文学作品。随之,蒙古文历史文献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这个时期重要的蒙古历史文献的产生大部分都与当时东亚政治大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系。当时是满洲贵族征服漠南蒙古地区,宣称他们是蒙古正统可汗,同时对漠北、漠西蒙古怀有继续征服的野心而蒙古民族将要失去独立地位之际。这些著作多数是以编年体为形式,从“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开始到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为主线,将他们后裔的历史写到史家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蒙古人的历史。有的史家由于深受当时正在鼎盛时期的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将成吉思汗及其先祖的历史与印度、西藏的转轮王统紧密联系起来,以图阐明自己祖先的圣洁和高贵。这些编年史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蒙古史家们记录民族存亡危机时刻的复杂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比较客观地记载了当时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的历史进程。

清代在蒙古地区流传的主要史学文献现有《蒙古源流》(1662)、《黄金史》(1665)、《黄史》(1651—1662)、《阿萨喇克其史》(1677)、《恒河之流》(1725)、《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1735)、《金轮千辐》(1739)、《大蒙古国根本黄金史》

(1765)、《水晶念珠》(1775)、《蒙古王公表传》(1779—1812)、《金鬘》(1817)、《宝贝念珠》(1840)、《水晶鉴》(1850)、《圣主成吉思汗传记》(18世纪中叶,松巴堪布·也摄斑珠尔著)等。

漠西蒙古卫拉特人被清朝征服的前后也用他们的圣哲扎雅班迪达创制的托忒文编写了几部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同样在蒙古地区流传。卫拉特人的著作有其地方特色,他们的所有史学著作几乎全部都是卫拉特地区的历史。我们应该提到的主要著作有《四卫拉特史》(1739),此后又出现了另一部《四卫拉特史》(1819),后者在前者内容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章目。另外还有《土尔扈特诸汗历史》(18世纪末)、《蒙古溯源史》(19世纪初)、《乌讷恩素珠克图土尔扈特与青塞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诸汗之世系表》(18世纪末)、《和鄂尔勒克史》(19世纪)等以及一些晚近的著作。

19世纪前后,在贝加尔湖周围生活的布利雅特蒙古人用蒙古文编写了与卫拉特人相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部族史。其中应该提到的主要著作有《霍里与阿辉布利雅特源流史》(1863)、《霍里十一父亲的溯源史》(1875)、《色楞格布利雅特史》(1868)、《巴尔虎津布利雅特史》(1887)等。还有一部以16世纪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巴拉珠娜夫人的传说》(约17世纪)的几种蒙古文传抄本在布利雅特地区广为流传。

有清一代蒙古人的历史文献中高僧传记文献也很重要。到了清代,蒙古地区的佛教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随之在蒙古地区出现了众多高僧。清代的蒙古文史料中,蒙古高僧的传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宝库。由于这些高僧往往又是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他们的传记大都有记事准确、时间清楚、涉及蒙古社会各个方面等特点,其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往往被清代的正史所忽略,因而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清代蒙古文高僧传记主要有:

1.《内齐托音一世传》:额尔德尼毕力衮达赖著,1739年成书。内齐托音(1557—1653)是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人,著名的宗教活动家,为西藏佛教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传记的作者根据内齐托音一世弟子们的备忘录、各种笔记以及当时社会各界的口述而撰。全书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叙述



了内齐托音的童年,出家赴藏;第二章在西藏札西伦布寺师从班禅学经,经土尔扈特到喀尔喀,然后到呼和浩特的经历;第三章是在呼和浩特地区周围山洞中修行三十余年的苦行僧生活;第四章为内齐托音一世前往东蒙古地区的传教过程:经当时的翁牛特、巴林到盛京,在科尔沁地区传教,清世祖顺治皇帝传其进京,返呼和浩特,再一次东返科尔沁等一系列活动;第五章为记录内齐托音圆寂情况。该传记是研究喇嘛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的第一手资料,尤其以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传教过程和佛教与萨满教的斗争记述更具价值。国内有乾隆间木刻版本和今人成崇德、申晓亭汉文译注本(《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和金峰的蒙古文《漠南大活佛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等。

2.《内齐托音二世传》:内齐托音二世弟子达磨三谟陀罗著,1756—1757年间成书。内齐托音二世(1671—1703),内蒙古茂明安旗人,一生都在漠南地区弘扬佛法,曾以清朝使者身份出使西藏邀请五世班禅(在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作者根据当时的口碑资料及自己掌握的有关材料撰写了他的童年、出家、学习佛法、奉命出使西藏、跟随皇帝出征厄鲁特等一系列活动,是研究17世纪末蒙古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国内有清代手抄本和乌力吉图的汉译本(《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和金峰的蒙古文《漠南大活佛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等。

3.《哲布尊丹巴传记》:据考察《哲布尊丹巴传记》有多种。主要有:①喀尔喀扎雅班第达·罗卜藏普梭列著《哲布尊丹巴一世传》,约成书于1702年,该部传记成为后人追叙哲布尊丹巴一世的蓝本。除蒙古文本外还有蒙藏文对照写本。②纳吉旺布喇嘛著《哲布尊丹巴一世传》,成书于1839年。此书基本资料出自罗卜藏普梭列著《哲布尊丹巴一世传》,但又增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有木刻本和手抄本。③《哲布尊丹巴一世至六世传记》,著者纳吉旺布喇嘛,约成书于1848—1851年间。此书虽简短,但由于它提供了其他这类传记所没有的哲布尊丹巴一世转世的情况,仍不失为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④《哲布尊丹巴一世至七世传记》,著者佚名,约成书于1859年。国内外有多种蒙、藏文版本流传。1961年,英国学者鲍登英译出版了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该传记的蒙文抄本(Ch. 鲍登《库伦的哲